

读史札记

新科状元不应唱

□ 滴水水

每年高考季，先是千万考生和万家长都在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真到成绩出炉，岁岁不同，年年相似，千千万万家庭中又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高考成绩十分重要，它不仅决定着上什么样的大学，而且往往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人生。但是，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能考得很好。因为，考试考得好不好，除了平时的学习成绩，还有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临场发挥、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再如复习对不对路，练习是不是中的，老师的指导能不能对上号等等。张张试卷，让人跌宕起伏，像一匹烈性野马桀骜不驯。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乃至整个社会，究竟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想起了大宋历史上新科状元不应唱的范围。

宋仁宗景佑五年（公元1038年）三月十七日，皇帝端坐在龙椅上，朝堂上云集大宋朝臣，朝堂外聚集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所有人都翘首以待，等待殿试结束后隆重的唱名仪式。“殿廷唱第过三人，则首礼部选者，必越次抗声自陈，率得置上列。吴育、欧阳修号耿介，亦从众。”（《宋史·范镇传》）主考官范雍大声唱出“吕溱、李洵、徐良佐”三人后，宋仁宗和满朝文武百官都把目光投向了新科状元范镇。为何呢？原来北宋殿试的次序不是按成绩高低排列的，而是按生源所在地排序的。礼部选定的本年新科状元，在主考官唱出前三个名字后，“必越次抗声自陈”，都会越过次序，直接向皇帝毛遂自荐，结果都“率得置上列”，皇帝直接钦点这个人新科状元，给予很高的职位，连耿介于世的吴育、欧阳修当年都是这样的。可本年新科状元范镇却像没事似的，“镇独不然，同列屡趣之，不为动，至第七十九人，乃从呼出应，退就列，无一言。”（《宋史·范镇传》）尽管同伴们不停劝他自陈，范镇就是站着不动。庞籍见新科状元没有一点动静，等了好一会儿，才继续按次序唱名，直到唱到第79名时，范镇才应唱出列，且应对后迅速入列，没有多说一句话。范镇的言行，“廷中皆异之”。

对范镇不应唱，后人有很多理解。我觉得《宋史·范镇传》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传记通过分析范镇的一生，清楚地告诉后人，这是范镇的本性所致。他就是觉得，我就是我，考得怎样就怎样，没有必要借皇帝在场、满朝聚焦的高光时刻，炫耀自己，博取声名。正因此，“廷中皆异之”。

仔细想想，范镇的率真言行是不应“异之”的。无论什么样的考试，成绩总是有高有低，名次总是有前有后，最关注的是成绩是不是自己的真实状况。只要是自己真实水平的反应，大可不必高分中榜似范进，低分落榜一蹶不振。科举也好，高考也罢，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经三次参加科举都落榜，然而他在政治和文学方面的重要建树，对后世影响深远。王阳明曾说过：“落第动心为耻”，他22岁时科举落榜，25岁时再次落榜，但他决不懊恼沮丧，发愤图强，终成明朝大儒。李时珍三次落榜后，放弃科举之途，转而投身医学研究，成了世代敬仰的医学家。苏洵、杜甫、李白、蒲松龄等众多著名大家，科举考试中皆落榜，而人生航船上全奋楫，把自己的真实才学贡献给社会，赢得世代赞誉。

范镇不应唱，其实并不限于科举。生活中凡有“应唱”场景，他基本都是不作声的。一次，朝廷官职调整，众人都认为范镇应得到馆阁校理之职，可范镇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意思也不表达，最后落了个较低低的职位。范镇一笑而过，欣然接受。“文彦博、富弼人相，诏百官郊迎。镇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陛下用两人为相，举朝皆谓得人。然近制，两制不得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闻见，是不推之以诚也。愿罢郊迎，除谒禁。’”皇帝要百官到郊外迎接文、富两个宰相入朝，别人都“应唱”，可范镇却劝皇帝“罢郊迎”。由此可以看出，范镇“不应唱”的性格，让他生活得率真、平实，低调而又自在。

尽管范镇不喜“唱”，但他的真才实学和优秀品格却唱响了大宋王朝。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三人翰林，四知贡举，以文著名，精通音律，司马光说他“勇者无敌”，苏东坡赞其“一语荣辱天下”，累封蜀郡公，高龄而逝，谥号忠文。

镇江地区诞生的八个新四军主力团

□ 孟宪威

镇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粟裕等人的率领下挺进苏南，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从此，镇江的抗日斗争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先后有八个新四军主力团在镇江地区组建，分别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二、三、四团，新编第六团，新编第三团，独立一团和第五十一团。这八支诞生于镇江的英雄团队作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转战茅山脚下、运河两岸和大江南北，为开辟、发展、巩固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乃至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为镇江革命斗争历史增添了荣光。

挺进纵队第一、二、三、四团

1939年10月底，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军部决定，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主力与管文蔚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合编，成立新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担负起开辟苏北的重任。

“江抗”和“挺纵”会师合编大会在扬中八桥镇广善堂广场举行，陈毅亲自到会并讲话。合编后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下辖四个团和一个直属特务营，共5000余人。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张藩任参谋长，陈时夫（后吉洛）任政治部主任。原“江抗”第一团改编为第一团，乔信明任团长，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廖政国任参谋长，杨浩庐任政治处主任；原“江抗”第二团改编为第二团，徐绪奎任团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廖昌金任参谋长，吕平任政治处主任；原“挺纵”第一、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三团，梅嘉生任团长，张震东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处主任；原“挺纵”第二、第三支队改编为第四团，韦永义任团长，焦勇任参谋长，鲍志椿任政治处主任。

1940年1月，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渡江北上，先后取得吴家桥反“扫荡”战斗、半塔保卫战、郭村保卫战等战斗胜利。期间，梅嘉生、张震东

率挺进纵队第三团两个营与陶勇、卢胜率领的新四军苏皖支队合编。

1940年7月，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统辖由苏北新四军各部整编而成的三个纵队九个团共约8000余人。原挺进纵队第一、第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一、第四团，原挺进纵队第二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第九团，苏皖支队改编为第三纵队第三团。10月原挺进纵队各部参加著名的黄桥决战，为开辟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沟通华中与华北的战略联系作出重大贡献。

新编第六团

新编第六团（简称新六团）组建于1939年5月。由新四军第一支队特务营和独立营组成，下辖两个营四个连。段焕竟任团长，王丰庆（后陈时夫）任副团长兼政治处主任。

1939年5月22日，新六团成立大会在句容二区毕墟村举行。此后，该团一直在茅山地区活动，经历了茅山顶宫、东西宋庄、延陵、贺甲、小丁葛庄、西塔山等20余次战斗，并多次参加反“扫荡”斗争。在著名的贺甲战斗中，新六团首先拦击敌人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对全歼该敌起到重大作用，显示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1940年春，因新六团第二营在攻打茅山顶宫日军据点战斗中伤亡较大，将句容东乡新建的特务大队（两个中队）改编为第二营第六连，剩人员补充给第二营第四连。7月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和第二团、新六团等部渡江北上。北渡前，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武装和苏南特委的特务连，分别编入新六团第一营第二连和第二营第五连。丹阳独立支队改编为新六团第三营。大批镇江籍的干部战士再一次补充新六团，使新六团的建制得到充实，全团共有三个营九个连，约1000余人。

1940年7月新六团北渡长江，编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斗序列，改编为第二纵队第六团。10月，参加著名的黄桥决战。

新编第三团

新编第三团（简称新三团）组建于1940年5月。以镇（江）句（容）江（宁）国民抗敌自卫团（原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为基础，与新四军第四团第三营第九连合编而成，下辖两个营六个连。巫恒通任团长，曾昭煜（后傅狂波）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

新三团编成后，活动于句容、江宁、当涂、溧水地区。1940年5月该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江宁县政府的反共摩擦，活捉县长张雍冲，缴获县常备队长短枪90余支。6月协同新四团、新六团反击进至西塔山之顽军两个团，将其击溃，掩护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7月编入一部分茅山地区的地方武装，部队扩大为三个营。9月在横山区镇压敌顽勾结掀起的大刀会暴乱，奋战一昼夜，打退大刀会的进攻。该团历经20余次大小战斗的锻炼，战斗力得到迅速提高，成为坚持茅山地区斗争的主力。

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后，苏南新四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新三团与长溧人民抗日自卫团合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巫恒通任团长。不久巫恒通调任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第四十七团由葛嘉慎接任团长，熊兆仁任政委，踏上新的征途。

独立一团

独立一团组建于1940年7月。由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和茅山地区的地方武装上升组成。王丰庆任团长，中共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兼任政治委员。

独立一团初建时，兵员不足800人，部队战斗力弱且缺乏战斗经验。但在王丰庆的带领下，抓紧整训，严格管理，同时开展积极有效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成长较快，军政素质显著提高。部队活动于茅山地区坚持对敌斗争。

1940年冬，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到丹北及溧、锡地区检查工作，后趁京沪铁路南返，途经太（湖）滆（湖）地区转往茅山抗日根据地。活动于太（湖）滆（湖）地区的独立二团副团长李复率一个连沿途护送，王丰庆率独立一团一部从茅山到太湖地区迎接。11月9日两部会合于武进县吊桥镇。次日突遭日军千余人袭击，发生吊桥战斗。经浴血奋战，邓振询安全突围，但王丰庆与李复等在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后，独立一团编入新三团。

第五十一团

第五十一团组建于1941年3月。由丹北地方抗日武装与新四军第五十二团第三营（该营原由丹北独立支队和“江抗”西路司令部直属队组成）合编而成，下辖三个连。张开荆（后韦永义）任团长，中共（京沪）路北特委书记陈光兼任政治委员，隶属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

第五十一团成立后，在扬中、丹阳、江都、武进、无锡、江阴等地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1942年4月下旬，第五十一团在丹阳县附近抗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保障我丹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1942年8月第五十一团建立一级建制机构。第一营辖原三个连；第二营辖三个连，由丹北各县警卫营上升组成，扬中县警卫营为第四连，山南（丹阳县）县警卫营为第五连，山北（镇江市）县警卫营为第六连。第二营组建后不久，即由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团长黄玉庭率领越过宁沪铁路，进入两溧（溧阳、溧水）地区活动，归第十六旅指挥，随后编入旅部和第四十六团。11月第五十一团团部和第一营奉命越过宁沪铁路，进入茅山地区归第十六旅指挥。该团在日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考验下，与苏南地区其他主力部队一起并肩战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冬，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第五十一团建制奉命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三营。

那年那月那些莳秧轶事

□ 涂俊明



黄梅三时，农家最要紧的“大活儿”莫过于栽秧，苏南水乡则有大半民区俗称为“莳秧”。“莳秧”，也是有点说法的民俗传统俚语：一是栽秧之时正值夏种“三三时”，是插秧的季节；二是插秧就是将秧苗从秧田拔出，移植到大田“自立门户”，成活发棵。老祖宗对这样的农活，起了“莳秧”之雅名，可见农耕文化智慧之至，“莳秧”实至名归，千年流传，称谓不变，名节不改。

农耕生活与岁月里的莳秧，还真曾有着不少的规矩与说法，大凡从后农业社会的农耕“规矩”里饱受甘苦的，都能够说出些许子丑寅卯来。

“单推秧”

莳秧，先得拔秧。旧时，拔秧多半是农家女的活儿。

年深月久的老规矩里，要求女人们端坐在秧凳上，腰背前倾，只能右手操开秧架“秧门”，左手辅助秧苗秆子，靠着右手发力拉拔秧，如此顺序渐进地推拉，女人们“一推一拉”劳作之中，把握在双手里的秧苗层层叠起，再洗净根部泥土，用秧不草打结成把后，秧把子便立于秧田水面。

莳秧时，男人们一抓到秧把，抽开秧不草，这样的“单推秧”就自动舒展，莳秧中，秧苗植株撒洛洛的。男人们边栽插着横平竖直的秧行，边称赞“单推秧”真好，是正统的“好秧把”！至于那些“双推秧”，就是双手左右开弓，各抓拉一把把秧苗，然后左右“两合一”，再扎

上秧禾草，“双推”的秧苗没有“单推”的整齐。插秧时，左手手中指“舔秧”，常常出现“乱棵”，影响莳秧速度。所以，人们最喜欢的就是最正统的“单推秧”。

“接手秧”

秧苗在“单推”女人们手里扎把成“支”，有的地方称这样的一“支”秧为一“捞”秧，以“六棵六横”间距计算，一“捞”秧大约可以栽插一两公尺长度的大田面积。挑秧手们从秧田里将秧把子一担担挑到大田，需要投向水面。每一趟“六棵六横”，都要投一支支秧把。

挑秧手像投掷手榴弹似的，向大田中央的莳秧手经过水路布局秧把。看准距离，准确投中间距与方位，最能干的挑秧手打出的是最准的“接手秧”，每每不多不少，秧把一支一支连接栽插，那是挑秧手、莳秧手双双最是默契的事儿。

“莳秧秧”

过去的地块水田，往往自然形状各异而奇特，长的、方的、圆的、弯的、斜的、S型的……莳秧时，往往遇上必要的拉直行距，这就需要过硬的另类莳秧本领。拉直莳秧行距过去不是靠拉绳子，而是靠着目测莳秧，一溜七棵或六棵，笔直延伸，为下一趟立下“标杆”。

当舵上位这样的“标杆”莳秧者，过去是德高望重的领头“大伙计”，或者身手不凡的长辈莳秧高手，乡间尊称他们“老秧手”。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队里每逢需要“莳秧秧”时，总是那几位老秧手。

遇上“莳秧秧”时，老秧手将三支秧把握着，点射一支到对岸，不偏不倚“定准”开头行，再放一支在脚下，立此存照“定位”收尾棵，又打一支到中央，三点一线“定中”全程路。老秧手快步操秧，开秧门抢速度，犹如田鸡跳水般地“波、波、波”地点射，秧棵植株忽而添上天下，忽而推拉分用，棵棵秧苗落地，行行翠绿绵延，笔直的趟趟茵茵舒展开来。

老秧手的秘诀大致有这些：手势准且腰板正，屁股当舵倒退走；双脚平拖不离泥，远瞄跨下对岸秧！

“蟹钳秧”

那年月，大凡年届十三四岁年纪的农家男孩儿，就得学着做要紧的农家活儿，其中莳秧为首，也是少年孩童们争相效仿的“大人活计”。

田野泥土之上，大人们当然就会教着孩子们那些莳秧的套路，手把手地演示传承了几千年没变的那些规定动作。“要栽蟹钳秧，莫插拳头秧，不要巴掌秧！”长辈们絮絮叨叨地叮嘱，寥寥寥寥地表演，为的就是教学一手祖辈传下的正宗标准的“蟹钳秧”技艺。

何为“蟹钳秧”？就像螃蟹的大鳌子夹取物品一样，将左手手中指“舔”付出的秧苗传送到右手，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配合动作，将秧苗传到中指，再由中指指尖将秧根直插水土，右手疾速抽回之刹那，秧苗便定植水中。“蟹钳秧”技艺，能使秧苗根部下入水土快捷，定苗落根浅，易于活棵，有利根系发达，莳秧农活里最标准的就是“蟹钳秧”。

旧时，大户农家选用莳秧手时，凡是“拳头秧”“巴掌秧”的“莳秧手”一概不取，见到“蟹钳秧”的老手，东家便会高价聘用，甚至高聘予以“大掌柜”的要职。

乡村莳秧时节里，莳秧趣闻轶事众多，诸如那最逗人的“屁股秧”，就是让人赶上了你，你又落下了，要让别人“关门”时，被后来者抓着黄秧把子抽打屁股，既逗人，又没面子；最艰难的“涝棵秧”，则是在众人比赛莳秧速度与质量时，你若频频出现秧苗浮空飘起水面，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出丑……

农事农活，各处各乡风，一地一习俗。像莳秧这样的大活儿，“大关节目”做法大同小异。

现在栽秧已基本不需要人工了，莳秧这门传统且讲究的老技艺，正在“栽植”进历史记忆的泥水里，成为一种滋润农耕传统文化的符号！



梅雨湿衣亦诗意

□ 钱续坤

“半湿半晴梅雨道，乍寒乍暖夏天天。”时逢六七七月间，在我国江淮地区至日本南部狭长区域，经常会出现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此时，器物容易发霉，故称“霉雨”；又值梅子黄熟之时，亦称“梅雨”或“黄梅雨”。

在过去以农耕为主的时代，梅雨就是不清自来的喜雨。唐太宗李世民就留有诗作《咏雨》：“和气吹绿野，梅雨洒芳田。新流添旧润，宿雾足朝烟。雁湿行无次，花沾色更鲜。对此昏昏夜，披襟弄五弦。”温暖湿润的雨水，能够使麦子迅速成熟，使水稻拔节分蘖，使水果增实添汁，这梅雨可谓是及时雨，是美甘霖。南宋的袁夔对连绵不断的梅雨和潮湿闷热的天气并没有抱怨，他认为这样的时节恰恰能使庄稼茁壮成长。其《梅雨》诗云：“江乡梅熟雨如倾，茅屋低头困郁蒸。小小闷人人莫厌，解教不稼勃然兴。”无独有偶，与袁夔同时代的戴复古亦吟道：“苔榻有泥妨客坐，稻田是水慰农心。老夫已作丰年想，鼓腹思为击壤吟。”（《喜梅雨既晴》）

有喜就有悲，悲的潮湿天气带来的霉变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郁闷心情。唐代刘禹锡在《浙东元相公书叹梅雨郁蒸之候，因寄七言》中写道：“平湖晚泛窥清镜，高阁晨开扫碧烟。今日看春最惆怅，为闻梅雨损朝衣。”古代的衣裳尤其是官服朝服，绝对是贵重的礼仪服饰，一般会精心保管，没想到浙江的梅雨天气如此厉害，翻出衣箱竟然发现朝服已被霉坏。白居易在诗作《感情》中也表达出同样的心情：“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婣娟子。可嗟复可惜，锦绣为里。况经梅雨色，黧花草草死。”诗人将其恋人所做的鞋子从长安带到九江，在将物品进行晾晒时，这才发现那双绣花鞋“色黧花草死”，已经霉坏了。

那么，在梅雨季节能否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且看宋朝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掌灯时分，好友迟迟未到，只好自己敲着棋子对着灯花发呆，虽无所事事，却乐在其中。”

